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张振勋与晚清铁路

ZHANGZHENXUN YU WANQING TIELU

◎ 魏明枢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院出版基金项目
梅州市人民政府客家研究学术出版基金项目

张振勋与晚清铁路

魏明枢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振勋与晚清铁路/魏明枢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6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ISBN 978-7-5623-3116-2

I. 张… II. 魏… III. ①张振勋 (1840 ~ 1916) - 生平事迹
②铁路运输 - 经济史 - 中国 - 清后期 IV. K828.8 F5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964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0964 87111048 (传真)

E-mail: z2cb@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责任编辑: 陈超乔丽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313 千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编委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春生	刘日知	刘志伟	李 嘉
李俊夫	陈春声	陈伟民	何星亮
吴庆洲	吴永章	林伦伦	周大鸣
栾 栋	麻国庆	黄志繁	程 颢

主 编: 房学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宋德剑	肖文评	邱国锋	房学嘉
钟晋兰	夏远鸣	曹知博	曾令存
温昌衍	雷近芳	谭兆风	薛访存

总序

刘日知 程飏^①

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客家文化是一个涵盖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民俗、建筑、宗教、艺术等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精髓的重要载体，以其民风民俗的古朴而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因而客家研究得到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美学、建筑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青睐，在海内外受到高度重视。粤东梅州具有“世界客都”之誉，是海内外客家人的故园圣地，保存有丰富的客家人文资源，具有开展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嘉应学院地处梅州市，依托客家文化资源优势，将客家研究作为学院主要科研特色，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客家研究院。

客家研究院一路走来，一直得到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和国内外同行的热情关心。客家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嘉应大学客家文化研究室”。1990年1月，遵照叶选平、黄华华等领导的指示，在客家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2006年4月，嘉应学院与梅州市人民政府联手，决定打造客家研究更高更大的平台，将梅州的客家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以客家研究所为依托，整

^① 刘日知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程飏系嘉应学院院长兼客家研究院院长。

合校内外各学科相关方向的研究力量，组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与“梅州市客家研究院”。随后研究院向广东省教育厅申报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过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全面深入的评估论证，2007年7月，广东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

客家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的成功，既是广东省教育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研究院长期以来在客家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肯定，说明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工作在全省所处的领先地位，当然这种领先地位的形成是与梅州地处客家腹心的地缘优势息息相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嘉应学院与梅州市的客家研究学术团队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的结果。嘉应学院开展客家研究的历史悠久，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十分注重客家文化研究，并且取得的成就在海内外客家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海内外研究客家的重要阵地，每年都有大批著名学者前来访学交流，并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夏令营等。

客家研究院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的客家学研究取向，在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中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与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长期以来，梅州比较封闭的山区地理环境，使得客家文化在这个区域能够比较原生态地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宝地。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同时也是客家学作为一门学问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观念的输入和客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批梅州籍的著名学者，如黄钊、温仲和、饶芙棠、邹鲁等，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积极提倡研究客家社会历史文

化，使之逐渐成为客家地区学术发展的传统和主流，取得了众多学术研究成果。1933年罗香林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而撰写的《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学的基本确立。从此，客家观念深入人心，客家学对梅州，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客家研究因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归于“寂静”。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客家研究重新崛起，发展至今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近20年来，嘉应学院依托这一文化资源和地域优势，致力于客家民俗、客家历史、客家社会、客家方言、客家文学、客家美术、客家音乐、客家建筑等文献和口述史的收集与整理，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多学科地开展对客家人文资源的挖掘与研究，发展和完善客家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其特色是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体验”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文献训诂、考据、文本解读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关注社区（community）历史以及社区与超越社区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

客家研究院继承罗香林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先后与美国、法国、日本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学术界开展合作研究，组织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进行客家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从1990年开始，先后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谢剑教授合作研究“围龙屋与客家宗族组织”项目，与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教授合作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项目，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迈隆教授合作研究“客家古文书研究”项目，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究“客家在乡商人与地方文化”项目，与中山大学合作研究“潮客文化与族群互动”等项

目，努力运用民俗学、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粤闽赣客家的生态、民间信仰和乡村社会、族群关系等，尤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族群与民间信仰、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乡村社会组织与社区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项目，研究方法与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尤其在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客家民俗学研究中，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为给予高度关注，其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有较大影响，其工作被称为“考今学派”。

客家研究院坚持把建设地方文献资料库，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作为客家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环节，给予高度重视。重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利用梅州的地域优势和嘉应学院在海外学术联系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开展各项工作计划时，尽量争取海外学术资源的支持，与海内外同行建立密切的学术联系。使国际合作渗透到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让国际交流与合作“内化”为学术研究过程自然而然的成分。尤其在定期组织召开国际性的客家学术研讨会，邀集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校，就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议题进行专门研讨，加强学术交流与学术建设等方面更具特色。客家研究院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获得海内外同行的认可和肯定。据统计，仅2000年以来，就举行了15次大型学术活动，其中以2003年12月的“客家文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月的“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的“纪念罗香林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的“粤东客家地域社会与文化学

术研讨会”影响尤为巨大。参会学者分别来自美、英、加、日、新加坡、法、韩及中国港澳台、北京、上海、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高校，其中不少是国际著名学者。

客家研究院坚持学术研究与成果出版相结合，注重提升梅州客家研究的社会影响。依托专业刊物《客家研究辑刊》，为客家研究学界构建学术交流平台。将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出版“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使之成为社会共享资源，则是落实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的发展规划之一，首批书目包括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历届在客家研究院（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精选。这是客家学走向世界、客家研究院打造学术品牌关键的一步。

客家学在国际学术界仍属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学术的竞争相当激烈，未来几年，是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能否继续保持这个学科在国内的学术优势，并继续提高国际交流和对话能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各位同仁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立足学科前沿，发挥地域优势和既有的学科优势，固本培元，苦练内功，加强学术积累，发展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改革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强学术创新和学术竞争能力，保持在客家学研究领域的国内优势地位，不辜负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的期望，抓住机遇，吸取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努力把客家研究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让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成为学术基础更加稳固，并有较强发展后劲的一流的客家学研究基地。

是为序。



序

明枢同志拿来他的书稿《张振勋与晚清铁路》，约我作序。我本来对这个题目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不敢妄加评点，但有两个原因使我觉得不便推辞。一个原因是我同明枢曾有师生之谊。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我从西北大学调至新建不久的汕头大学工作，当时汕大历史系在著名近代史学家李时岳先生（时任汕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的带领下，很想在中国南方沿海经济特区的这所新办高校里建成一个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史学教育与研究基地，因此一面四处延揽史学人才，一面抓紧本科招生与教育，明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汕大历史系学习的。我当时为明枢所在的班级上中国近代史课程，后来又指导他写作毕业论文，他的勤奋好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明枢毕业之后，去了梅州嘉应大学工作，而我不久后也调来广州，彼此见面机会不多，但明枢仍时常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同我联系，向我提出一些治学方面的问题进行切磋，使得我对他在学术上的追求与努力有着较多的了解。明枢近年来发表过若干有见地的史学论文，而作为史学专著，这部书稿还是第一部。因此在此书付梓之际，我理应写几句话，表达对明枢的祝贺与期望，也是为他在学术上的成长过程作一个见证。另一个不能推辞的原因，是这部书稿所写的，乃是张弼士（即张振勋）这个人物。作为近代爱国华侨领袖、著名实业家、南粤先贤，张弼士一生对国家、对中华民族有卓越的贡献。他从一个粤东贫苦农家出身的出洋打工仔，奋斗成为南洋华侨首富和侨领，富裕之后仍不忘国家和故土，在国内投资创办了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经营范围涉及工、农、矿、商、交通、金融等众多领域，被时人誉为“实业奇才”、“中国的洛克菲勒”。其炽热的民族感情、近代企业

家的魄力、眼光和实干精神，都值得今天人们大书特书、详加论列。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迄今国内有关他的研究成果不多，已发表的文章和传记作品大都属于一般性的介绍文字，缺乏史料的发掘、考订和深层次的探索。有感于此，广东历史学会近年有张弼勋研究专业委员会之设，以期联络各方热心人士，推动对张弼勋的研究。我作为这个专业委员会的会长，有推介张弼勋研究新成果之责，自然不可懈怠。

明枢的这部书稿，原是他任中山大学邱捷教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后经进一步的修改、补充而最终完成。还在明枢写作硕士学位论文阶段，我已有幸读过其初稿，现在再读，感到它比初稿充实了许多，尤其是书稿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

首先，是研究的切入点选择得比较恰当。张弼勋一生在海内外的活动相当广泛，有在商界的，也有在政界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要进行全面性的研究，在目前史料和研究基础都比较缺乏的情况，不仅难大，而且容易流于泛泛。有鉴于此，书稿选择了以往较少为人注意却又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巨大的铁路建设问题，以“张弼勋与晚清铁路”这个专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书稿详细梳理了张弼勋参与晚清铁路擘画与建设的经过，探讨了他在芦汉、粤汉、广厦、广澳等多条铁路的建设或筹划中所发挥的作用，论证了张弼勋作为晚清铁路建设先驱的重要历史地位。事实说明，这样切入的结果是成功的，书稿之所以写得比较深入，首赖于此。

其次，是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张弼勋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发迹致富、经商为官、家庭生活，民间有许多传说，加之有关他的原始资料十分分散，今日已不易觅得，故而已往发表的关于张弼勋的著述中时常会出现以讹传讹、将传说当作史实的情况，亟待根据确凿史料予以厘正，这也是国内张弼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表现。明枢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这部书稿中，他立意首先要在收集、考订史料的基础上去进行研究，以期“还原历史”，“让张弼勋从传奇人物转变为

历史人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书稿广泛征引资料，据书稿后面所附“参考文献”目录，全书利用史料的数量达到100多种，参阅前人论著170余部、文章200多篇，这对一部篇幅不大的书稿来说，可称得上是广征博引了。同时，书稿对所引用的资料，不是简单地加以罗列，而是认真进行比对、考订，从中发现问题，找出真相。这也是书稿中除正文外又有大量注释文字的原因。唯其如此，书稿才能够将张弼士在晚清铁路建设中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活动真实地还原出来，谱写了他人人生历程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其三，是对学术规范的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本来是作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失此即谈不到学术，但是国内学术界近年来浮躁、虚夸之风甚盛，一些青年学子为求名利而在研究工作中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规范，只图早出、快出、多出成果，造成粗制滥造和水平重复的现象，甚或有假冒伪劣作品的出现。这部书稿显然非此类作品可比，无论是在对前人成果的介绍与尊重上，还是在史料的利用、征引文字的注释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从而保障了书稿的科学性。

有此三点，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显然可以确定，而且据我所知，它应当也是目前国内研究张弼士的首部学术专著。当然，既为首创，虽有开辟草莱之功，也难免有初出茅庐的稚气。就书稿所研究的课题而言，无论是在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上，还是对于张弼士在晚清铁路建设中思想与行为的剖析、对他与方方面面关系的梳理，都还有着继续深化与提高的余地。而就张弼士研究而言，书稿也还只是这一历史人物部分活动而非全面性的研究。因此，我热切期望明枢在这一课题的研究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我也期盼国内张弼士的研究以此书的出版为开端，有更多更好的学术专著问世。

赵春晨

2009年3月写于广州海月轩

前言 张振勋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张振勋，广东大埔人，是对晚清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华侨大资本家。

在现有的研究中，张振勋的名、号非常混乱，常常是互相混用。在研究张振勋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清朝及北洋政府的官方文献（如《清实录》等官方文档以及在正规的场合中）都用张振勋一名，民间一般都用张弼士一名。张振勋自己向政府的报告以及一些正式文件中也都以“振勋”或者“勋”一名。证诸郑官应《张弼士君生平事略》，此想法或许是对的。该文一开始便说：“君号弼士，又号肇燮，印振勋。”^①“印”乃小字，按笔者的理解，此意为官印上所刻字，即官名。《大总统特颁前参政院参政张振勋碑文》亦说：“君讳振勋，字弼士。”^②李松庵则说：“张弼士号肇燮（在海外发迹后才用振勋别字）。 ”^③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因为筹賑江皖赈务，两江总督曾国荃特奏颁赠匾额十五面给南洋各埠、各帮与各该人，其中，槟榔屿张肇燮是：“义昭推解”。^④可见此时他仍然用张肇燮一名。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在大埔等地的调查以及与一些学界、政界人员的交谈中深切地感受到：张弼士一名更为人所熟知，张振勋一名则普遍显得陌生，甚至有因此特别建议笔者改用张弼士一名者。但是，本书主要讨论的是他在

①② 郑官应辑：《张弼士君生平事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第74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5，第25页。

③ 李松庵：《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1963年，第158页。

④ 《赠颁旌扬》，《叻报》1889年8月12日，第5页。

晚清的官方活动，故用张振勋一名。

关于张振勋的出生年月，王发志认为共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1841年12月21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和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种说法。他根据郑官应《张弼士君生平事略》的记载及张振勋去世后大总统碑文推算皆为前者，即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1841年12月21日）。^① 郑观应在闻知张去世之时，他曾特赋《感事》一诗，诗中说张享年79岁，^② 据此，张振勋出生于1837年。不过，郑亦有《寿张弼士观察六十初度》一诗，诗中说：“公（即张振勋）创办粤汉铁路。”^③ 显然，张振勋60岁时已经“创办粤汉铁路”，而1897年粤汉铁路才有修筑创议。因此，郑在《感事》诗中所说张79岁是错误的。按照《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11月1日（丙辰年十月十六日）“香港新闻”载：“查张君享寿七十有五岁……”据此，亦应为1841年。

张振勋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少年时因家中生活十分贫困而给人放牛，终于跟随华侨“过番”^④ 去，这是近现代时期客家人的一条重要的谋生道路。关于张振勋“过番”的时间，有14岁、15岁、17岁、18岁等不同说法。例如：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中说是14岁。^⑤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则说：“15岁到巴城。”^⑥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

① 王发志《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生平与思想研究》第二章，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②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61，第1360页。

④ 客家人通称去海外各国为“过番”。番是“旧时对西方边境各族的称呼，亦为外族的通称。如西番，番邦。又以指来自外族或外国的事物。如番茄，番饼”。《实用汉字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1294页。

⑤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民国丛书》影印本，第279页。

⑥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2页。

亚华侨史》：“17岁时南渡至巴达维亚谋生。”^①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十七岁时（1856年），他离家前往荷属东印度寻找发财的机会。”^② 李学民、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侨史》：“18岁时出洋谋生。”^③ 按照《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11月1日（丙辰年十月十六日）“香港新闻”载：“查张君享寿七十有五岁，经营商业凡六十年，初本由穷家出身，一八五八年侨居北打威……”据此，张振勋于1858年“过番”说当是更合理的。

到了南洋，他“以种植而获大利，随在南洋各埠大张矿务。”^④ 经过艰辛的打拼，他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从放牛娃到千万富翁，这是一个经济巨人的崛起过程。然而，张振勋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崇高地位虽源于他是一位华侨富商，却不仅仅体现于此。

有论者强调：新、马华侨对于辛亥革命的支持和参与主要是华侨中的下层，中小工商业者，即中小资产阶级是积极拥护和参加者，他们在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激进，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坚决、最激进的一部分。而华侨中的大资本家，除了个别有民族自尊心的能够支持革命外，一般都持不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如陆佑和姚东生等。^⑤ 而同样具有七八千万家产的张振勋却是极少数的例外，他默认他的长子张秩君加入同盟会。其实，无论他是否积极参与革命行动，张振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位重要历史人

①⑤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0，第271-273页。

②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144页。

③ 李学民、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

④ 《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11月1日（丙辰年十月十六日）“香港新闻”。

物,^① 其地位主要源于他无可否认的对于中华民族的热爱, 源于一位华侨的“中国心”。

相对于南洋一些富豪, 张振勋对于华侨“海外孤儿”地位的体会更深刻, 他的民族国家观念更加强烈。在南洋创业过程中, 在与洋人的交往中, 他逐渐树立了“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② 的信念, 进而有意识地寻求祖国的保护, 开始主动向中国政府反映华侨事务, 并积极参与中国的海外募捐活动。夏东元认为, 张振勋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通过盛宣怀向李鸿章反映荷属华侨情况。从现有材料看, 这是他与国内高官最初的联系。但夏东元所根据的《盛宣怀上李鸿章禀》^③, 内有“光绪十六年,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奏明……”且有“据办理荷兰国山东赈捐委员、候选知府张振勋来烟面禀”一句, 此事显然不可能发生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查盛宣怀与李鸿章之间的往来电文, 此事应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七月间。在此期间, 盛宣怀与李鸿章就张振勋所反映的荷属华侨受虐而寻求保护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努力。他们先希望总署设领, 遭到否定后便与荷兰驻烟台领事进行了大量的交涉, 希望荷兰葛罗巴总督能够“准予优持”华侨, 特别是有“官职体面人”。这主要是由于张振勋担任了“办理荷兰国山东赈捐委员”, 而盛宣怀则“系专管赈捐, 为救穷民起见”而在荷属发动赈

① 长期以来, 论者高度重视张振勋是否参与革命的问题。2006年12月, 在广州召开的张振勋研讨会上, 李吉奎发表了《张弼士巨款援孙说质疑》, 否定了张振勋以30万元援孙革命说。他还强调说: 张振勋“确实是清民间有特殊业绩与贡献的侨商。世人对他有明确的历史定位, 原不必借是否支持过革命党作为标尺去度量其历史地位之高低。”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

② 郑官应:《张弼士君生平事略》,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第747册,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年, 第10页。

③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324-326页。

捐，他们企图“趁此赈捐将有力者准予优持”。^①

另外，张振勋回忆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办之前与盛宣怀见面并达成了创办葡萄酒公司的共识时也说：“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勋旋香港，今督办铁路大臣、前东海关道盛电邀至烟，商办矿务、铁路等事宜。”^② 张振勋向盛宣怀所反映的内容，后来郑观应有感于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人移民而将之转交香港《实报》总编辑潘兰史刊登，以“普告同胞”。^③ 比较《盛宣怀上李鸿章禀》与《〔附录〕葛罗巴华商禀政府荷兰南洋各属土苛待华侨各款》^④，前者正是对后者内容的摘录和概括。

正是在大量参与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慈善事业的过程中，逐渐地，他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至一八九三年，受中政府委任为庇能首任之领事，翌年即升为星洲之总领事。”^⑤ 作为业绩辉煌的华侨富翁，他受到了侨居地殖民政府的重视，但他婉拒英、荷殖民当局给他封官赐爵。他一生有许多封号和职务，却只承认中国政府的封号，这当然暗示着他的人生意义更重要地在于他与中华民族相结合。

张振勋以他在国外创造的大量财产和对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而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国内实业建设，进而参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戴鞍钢指出：“面对急迫的民族危机，国内很多人主张实业救国并付诸实践，不少海外华侨也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前已提及的

①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册电稿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6-388页。

② 张振勋：《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2页。

③ 郑官应：《致香港〈实报〉总编辑潘兰史征君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83页。

④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83-593页。

⑤ 《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11月1日（丙辰年十月十六日）“香港新闻”。